

有的中小企业一半利润缴税费

人民日报记者对此进行调查,专家:“隐性”负担有6种

眼下,国内中小企业普遍反映税费负担仍然偏重,记者调查的几家中小企业反映,有相当于一半左右的利润缴了各种税费。

“做梦都盼着减税!”

李京生是一家包装制品公司的总经理。成立于1993年的这家民营企业,从糊信封、做手提袋开始一点点奋斗,现在拥有员工60多人。一年摸爬滚打下来,李京生的公司能赚120万元左右,但各种税费却数量不菲。算下来,每年得交70万元税费,到手的净利润只有50万元,大约58%的利润缴了税费!“我们做梦都盼着减税!”李京生说,中小企业的实际税负往往比大企业还高。“比如,我们买纸张常常是根据订单情况零星采购,今天买几百张,过几天

又买几百张,而大企业至少要够几吨才卖给你,并且要求交现金。于是,我们只能向小企业买纸,而他们一般没有增值税进项发票,无法用来抵扣成本,无形中增值税就会多交20%。这种现象在加工型中小企业中比比皆是!”

中国社科院财贸所税收研究室主任张斌坦言,目前我国中小企业要缴纳、承受6种税费或“隐性”负担:税,包括增值税、营业税、所得税等;费,包括教育费附加、水资源费、社会保险费等,据估算,通常交1元税,就要交0.5—0.7元的费;有关部门提供有偿服务收取的费用,比如集贸市场收的卫生费,这类收费有些定价不合理,但还不能不交;一些执法部门为了创收进行的罚款和摊派;一些执法部门吃拿卡要等腐败成本;为应对名目繁多的检查而付出的人员、时间成本等,即遵从成本。中小企业协会会长李子彬日

前对媒体表示,中小企业的实际税负已超过30%。

减税费还有空间

专家认为,当前中小企业税费负担仍然偏重,减税费还有空间。应当完善税制结构,坚决取消不合理收费。“发达国家税收以所得税为主体,2007年美国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社会保障税占税收比重高达72.5%。增加所得税等直接税比重,有利于改变我国中小企业‘挣得少交得不少’的现状。”改善中小企业经营环境,降低遵从成本。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孙钢认为,政府有关部门应减少对中小企业的行政干预,避免增加其隐性负担。此外,还应合理设计税费优惠政策,真正惠及最大多数的中小企业。

有专家指出,要多放水养鱼,千万不要竭泽而渔。

据人民日报

对话

仇向洋:期待更好的政策优惠



仇向洋
东南大学经管学院副
院长,兼任南京市企业
家协会副会长

现代快报:说到中小企业税负重,有人认为,中小企业的实际税负往往比大企业还高。

仇向洋:关于中小企业的税,要看站在哪个角度讲,是站在投资者角度,还是站在企业角度?中小企业的税负不可能比大企业高的,因为税都是一样的。什么样的企业是中小企业,什么样的企业又是大企业,这是有界定的,我认为相关税负没有这样大的差别。

现代快报:作为中小企业,特别希望减税之策能真正落到实处,特别希望受到公平的对待。

仇向洋:减税的事涉及法律,而且应该有整体性。在税的问题上,不能说小企业减税,大企业就不减了。

现代快报:巴西于2004年出台《小企业法》,而韩国早就有了《中小企业基本法》,这种以法律保护中小企业利益的做法对我们有什么启示?

仇向洋:我国对中小企业也有一定的保护的,比如说按照你的利润的百分之多少一并征收,这本身就是一个保护性政策。

当然,立法保护中小企业也是需要的。中小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需要政策的扶持。政策扶持的意义在于,政府也是在培育税源。如果中小企业垮了,那无疑是失去了一大税源。企业做大靠资本,做强靠科技,做好才是靠管理。企业做大是要靠资金的,而资金的来源要靠贷款,还要靠自由资金积累,还可以吸收外来投资。但小企业的信用有限,在获得信贷方面肯定不如大企业,而如果政府把税抽得过多的话,那自由积累这一块就比较弱了。积累、投资的钱是在税后的,需要呼吁的是,中小企业用于再发展的资金,这部分的税可以减。

现代快报:对于中小企业的扶持,减税是其中之一。作为南京市企业家协会副会长,你对于政府扶持中小企业有着怎样的期望?

仇向洋:我认为,政府对小企业的支持不仅是在税收上,而且要全面支持。小企业在解决就业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南京市政府最近提出打造21个创业特别社区,我们期待着有更好的政策优惠和创业环境。快报记者 刘方志

相关新闻

财政部相关负责人:从国际比较看我国目前宏观税负水平并不高

14日,财政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从国际比较来看,我国目前的宏观税负水平并不高。

这位负责人介绍,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口径计算,2010年,我国宏观税负为26.4%,2009年为25.3%,而2009年世界各国平

均水平为36.4%,其中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为40.8%,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为32.9%。

2009年,福布斯杂志发布了“税负痛苦指数”榜单,其中中国税负痛苦指数为159,在公布的65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二。近期,

这一话题再次引发热议。财政部负责人指出,这种税负痛苦指数在反映税负高低问题上存在缺陷,如指数选取的名义税率不等于实际税率,实际税率往往比名义税率低。

新华社记者 何雨欣 徐蕊

快报快评

“厨子施工”丑闻岂能一“撤”遮百丑

□快报评论员 伍里川

自新华社披露吉林省内在建靖宇至松江河铁路线中存在严重工程质量问题后,“骗子承包、厨子施工”一时成为史上工程“名篇”。现在,铁道部发布了对吉林省宇松铁路严重质量问题的查处结果,16个用渣土浇灌的桥墩进行爆破拆除,铁路线涉及的相关单位和人员也将进行相应处罚,不合格工程全部返工处理。

公允而言,此次查处结果可称为非常严厉。在一些重大事件中也并不多见的“撤职”也显现身影,比如说九局主管工程建设的副局长赵铁军撤职,负责施工的九局三公司总经理王兆威撤职。沈阳铁路局宇松铁路建设指挥部相关责任人将予以撤职、免职、降级等处分;而中铁九局被“停标”一年更是意味着他们明年面对铁路基建大蛋糕只能颗粒无收,付出的代价不可谓不大。

不过,这种严厉仍然只是相对的。此事件,有行政责任,更

有法律责任,现在的处理还只是停留在行政处罚这样的“技术性”处理阶段,相关单位和人员的法律责任尚未被追究。因此,公众更期待司法的介入,通过多方用力,将这一起重大的工程质量事件的“桌子底”彻底掀翻。

墩可炸,工可返,我们有没有对其中暴露出来的涉法问题进行调查?例如,打着“江西昌厦”旗号的骗子要查,这是当然,可是骗子为什么能行走江湖而不倒?新华社报道中提到,中铁九局三公司一名负责人不经意间透露:“江西昌厦是沈阳铁路局的一个高层领导介绍进来的,你说我们怎么审查?”无疑,对于这样一个重大线索怎么能不继续深挖?一旦这样的情况坐实,那么这就不是简单的一起工程质量事故,就不是简单的一起合同诈骗,而是腐败大案。

问题是,现在不仅没有听说司法部门介入调查,甚至未尝听说骗子被抓。当然,司法介入有

其特别程序和要求,有时甚至要做到查而不宣。但是作为铁道部相当正式的查处结果,是不能绕过相关“篇章”的,要知道,“高层领导”何许人也,全国人民都倍加关注。

从常识和经验来说,“层层转包”历来是一些重大事故的罪魁祸首,“层层转包”既违法,又害人,特别需要穷追猛打,揪出幕后利益推手,从而为类似事件的处置开一个好头。的确,这起事件尚未酿成大祸,但是一条连建设者都直言不敢坐火车的铁路,它的存在何异于“谋财害命”?如果到头来,一声炸响,一了百了,岂不是太便宜了点?

需要注意的是,此次事件是媒体揭露的,需要警惕那些没有被揭露的工程也“藏污纳垢”。但如果在本次事件中,只有行政问责,没有对法律责任的追究,没有反腐的重锤出击,那对于暗中的违法乱纪者提供的又是何种信息呢?

公民发言

取消“春晚节目”评选是因噎废食

日前,经央视春晚宣传组证实,龙年春晚将取消“我最喜爱的春节联欢晚会节目评选”。央视表示,取消评选的原因是多年来评选结果与实际不符,并且对今年“回家过大年”的主题没有意义。

(11月14日北京晨报)

一贯特立独行的央视终于承认“我最喜爱的春节联欢晚会节目评选”结果与实际不符,不能不说是一种尊重民意的进步,但却因此取消评选,更让人看到其狭隘的一面。这就好比说,评选结果与实际不符是因为评选本身有问题,而实际上,“观众最喜爱节目”评选并不存在任何原罪。

从这个角度来看,央视私自取消“观众最喜爱节目”评选,只不过再次向世人宣告,“观众最喜爱节目”评选完全由央视操控,而这才是“我最喜爱的春节联欢晚会节目评选”遭遇公众诟病的根本原因所

在。正是由于央视完全操纵整个评选过程,让评选结果与民意表达的距离相去甚远,甚至背道而驰,才导致评选逐渐丧失了公信力。

现在,央视终于做出壮士断腕的抉择,只不过,这种慌不择路的切割行为并没有切切实实为民众考虑,因为民众需要这个评选。

尽管春晚的满意度有所下滑,但作为除夕夜全球华人的精神年夜饭,春晚仍然深受广大民众的喜爱与追捧。那么,一场全民寄予深切厚望的年度盛宴,评选出几个“观众最喜爱的节目”,在加春晚与观众之间的互动之余,推动春晚向符合更多民众期待的方向发展,有何不可?

其实,将央视春晚“观众最喜爱节目”的评选交由具有足够公信力的第三方组织和实施,就真正回归民意了。

廖水南(重庆 媒体评论员)

女孩“临终日志”是写给社会看的

广东女孩黄妮超初二时检查出患有系统性红斑狼疮。2007年,黄妮超考上了南方医科大学。大学时曾同时打4份工。今年6月,黄妮超大学毕业,因为患病,初试便被很多单位拒绝。7月份,她开始把每天的经历写成日志,为此,网友称之为“临终日志”,并呼吁为黄妮超募捐。

(11月14日 新京报)

“临终日志”,如同自己写给自己的悼词。这是对死的看淡,更是对活的不舍。阅读这些用生命撰写的“临终日志”,网友为黄妮超的遭遇而唏嘘、流泪,被黄妮超的坚强和从容所感动。但感动之余,社会也要有所反思。

即便黄妮超的病不能最终治好,即便无法阻止死神的降临,但我们却有能力和责任让她活着时有保障、得帮助,离去时不孤单,有尊严。但我们做到了吗?没有。如果做

到了,就不会让身患重病的地跪着哭喊“救救我”;如果做到了,就不会让身单力薄的她为凑买药钱同时打4份工;如果做到了,就不会让家境贫寒的她面临没钱住院的窘困;如果做到了,就不会让刚刚毕业的她希望找份好工作来为治病筹钱,面对的却都是歧视和拒绝……

不到最后,不能轻言放弃。即使到了最后,也希望奇迹能出现。我们希望在黄妮超治病期间,不要再一个人面对病痛和死亡,不要只有热心网友奔走相助。我们希望有关单位和部门能好好读一读她的“临终日志”,虽然日志是黄妮超写给自己的,但何尝不是写给这个社会的?我们更希望相关的医疗和救助机制能够迅速启动,发挥它们本该起到的作用,当然,这个机制不但要能帮助黄妮超,还要能帮助千千万万需要帮助的人。 宇微(北京)

新华时评

“归零”的监督机制必须面对社会考问

因为媒体披露,近乎荒唐的宇松铁路严重质量问题得以浮出水面。面对这一事件,人们为错误被纠正而欣慰,但更有强烈的后怕和激愤:没有媒体揭露,此事又当如何?在事情的演变过程中,内部监督、质量监理、招标投标制度、安全监管等一系列规章如何陷入“归零”一般的境地?还有多少车辆、多少生命悬在脆弱的桥墩之上?

新闻媒体作为一种外部力量,掌握情况十分有限,从理论

上讲,其监督效果远不如工程监管者来的有效和直接。然而从宇松铁路调查的情况看,种种监管机制在建设过程中根本没有发挥作用。

不难看到,确保工程质量的种种机制、规定,仅仅因为一句“高层的关系”,就像塔罗牌一般被全部推倒。工程质量出现问题其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正常的监督机制、纠错机制失灵失效,更可怕的是让媒体和公众成了最后的问题发现者。

近年来,食品安全、环境保护、工程建设领域发生的三聚氰胺奶粉等事件,情节十分严重,但都是媒体进行调查才予以揭露。其中暴露政府有关部门的“后知后觉”,企业监督自律的空置,行业规章制度的失效等屡见不鲜。这不是媒体之幸,而是社会之痛。

从这个意义上讲,治理失效的内部监督机制,比拆除重建问题桥梁更为重要。

新华社记者 姜琳 张建